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学新进展

靳桂云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在中国史前考古尤其是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海岱地区史前文明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高广仁等,1984);在中国史前考古年代框架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以大汶口和野店等大汶口文化、尹家城和西吴寺等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的整理和出版为契机,经得起反复检验的、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框架基本建立(栾丰实,1997),并成为相关区域考古学年代框架研究的重要参照系;比较丰富的绝对年代数据,不仅有助于开展区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对比分析,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尝试将海岱地区原史时代的历史文化与传说时代进行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可以深化中国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讨论。而上述诸种,在放射性年代学取得重大进展的21世纪,意义更加凸显。

随着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增多,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更多的炭化种子果实和骨骼测年,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从原来的约距今3900年变更到距今3750年(张雪莲等,2014),进而使考古学家重新认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张海等,2013),也开始重新审视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两城镇遗址测年数据显示,龙山文化二期之末到三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200—2100年,龙山文化第四期结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50年(栾丰实,2016),如果按照龙山文化分为六期、每期持续时间大约在100年观点(栾丰实,1997),龙山文化第六期结束的时间(同时也是龙山文化结束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靳桂云等,2011),一系列新的测年数据都促使考古学家重新认识龙山文化的年代(Wicks等,2015;孙波,2020)。也有学者采用贝叶斯软件进行模拟,对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进行了重新认识(Long et al., 2017),尽管其结论有待商榷,但对于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学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必须的(饶宗岳等,2018)。总体来讲,龙山文化的年代可能在距今4400—3800年之间。

根据龙山文化结束的年代和近年来比较可靠的一些测年数据,我们推测北辛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6700—5800年,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800—4400年。

在滕州官桥村南遗址(Jin et al., 2020)和临沭东盘遗址(Jin et al., 2016),炭化种子测年分别是距今6300—5970和6200—5800年,而与这些种子共出的陶器则属于北辛文化中期(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2019)。后李遗址北辛文化时期人骨测年为距今5987—5726 cal. yr BP(Hou et al., 2022);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研究结果中未提供北辛文化遗存(陶器等遗物)的分期信息;从年代数据看,相当于北辛文化晚期,此前后李遗址发掘简报中将该遗址中的北辛文化遗存归为北辛文化晚期(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1992)。可见,官桥村南、东盘、后李三个遗址,炭化种子果实和骨骼的AMS测年结果都显示,北辛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在距今约6300—5800年;而根据木炭测年推测的北辛文化早期年代约为距今7000—6600年,中期年代为约距今6600—6300年,晚期6300—6100年(栾丰实,1998)。研究表明,来自同一个遗址单位的种子果实测年比木炭测年更年轻且更准确(Dong et al., 2014),那么,北辛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是距今6300—6000年,而早期可能在距今6700—6300年,晚期则大约在距今6000—5800年;即墨北阡遗址北辛文化晚期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种子果实测年是距今5800—5400年(5800—5400cal.yr BP, 95.4%)(Jin et al., 2016),也支持将北辛文化结束的时间推定在距今约5800年。

而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阶段遗存测年是不超过距今5000年(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2019),则进一步支持了这里对于大汶口文化年代区间的推测。根据木炭测年推测的大汶口文化的年代是:早期6200—5500,中期5500—5000,晚期5000—4600(栾丰实,1997)。这样一来,根据种子果实测年所建立的大汶口文化绝对年代框架,总的持续时间从原来的1500年缩短到1400年,大汶口文化开始的时间从原来的6200年变成现在的5800年(晚了400年),结束的时间从原来的4600年变成现在的4400年。

考古学文化序列上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AMS年代,大约在距今8300—7700年。月庄遗址炭化种子的年代是距今8000—7700年(Crawford et al., 2016)和公元前6060—5750年(2 sigma)(Crawford等,2006),西河遗址炭化种子的年代是距今8100—7900年(Jin et al., 2014);后李遗址后李

文化人骨测年数据是距今8323—8178年(Hou et al., 2022)。张马屯遗址是区域内唯一一处介于后李文化与扁扁洞一类遗存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来自同一个房址垃圾堆中的炭化种子测年都在距今9000年左右(Wu et al.,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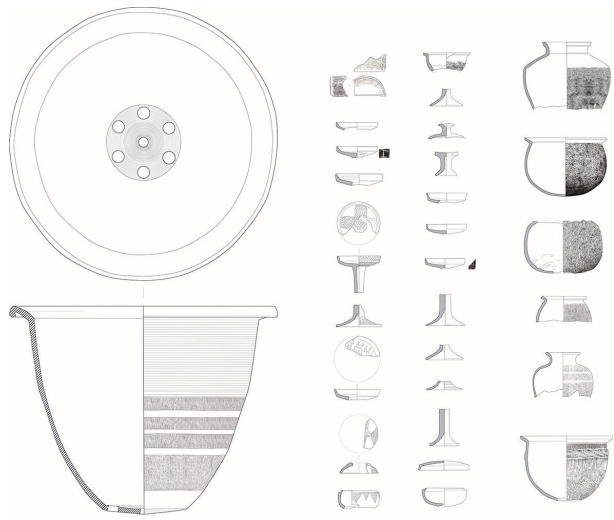
在泰山沂山核心地带,分布着一系列的全新世早期的洞穴遗存(李罡,2017),只是有的洞穴遗存已经被破坏殆尽。位于沂源桃花坪的扁扁洞,有龙山文化、北辛文化,甚至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保存下来,这种更早的遗存,其陶器的形制具有显著的原始性,但与后李文化、张马屯一类遗存有一定共性,就更是如此,前人开展的相关研究之所以与考古数据明显不符,主要原因并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数据的质与量制约了相关方法的运用。

从表面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植物考古特别是浮选法的普及,更多的遗址得以开展AMS测年工作,人骨和动物骨骼样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测年,这不仅增加了年代数据的数量,更提高了数据的质量,使得我们能够据此更深入地探讨一些社会与文化历史过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海岱地区如此大的空间范围,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距今11000—4000年,7000年的时间),现有的这些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还是显得太少了;特别是当我们尝试讨论聚落变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某些重大变迁的细节的时候,总是会受到年代数据不足的制约。所以,现在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数据还处于数据积累阶段,进行一些综合分析,还显得数据不足,至于用贝叶斯统计方法来分析这些数据,就更是如此,前人开展的相关研究之所以与考古数据明显不符,主要原因并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数据的质与量制约了相关方法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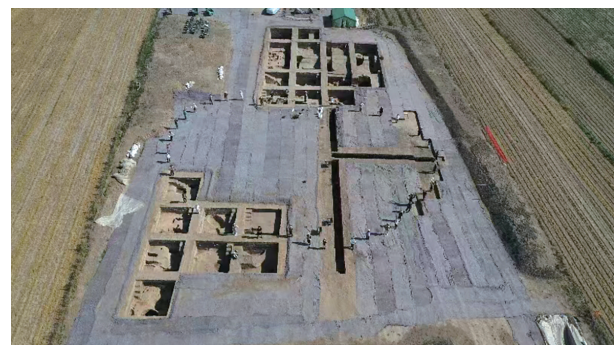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专家论证山东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现

高继习



J16出土大陶甗与T11、H550、H461等东周遗址出土陶器体量对比示意图



人圈围成的T11范围

8月8日上午,山东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现论证会在山东省高密市举行。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徐龙国,山东省考古学会会长郑同修,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杨爱国,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兰玉富等专家学者出席论证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主持论证会。潍坊市副市长狄波、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权文松、高密市委书记王文琦等出席相关活动。

与会专家首先到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询问相关遗迹现象,并参观了山东大学考古实习基地及前冢子头遗址出土文物标本。论证会上,考古负责人高继习汇报了遗址整体状况及主要考古收获,对战国圆形台基遗存进行了重点介绍与解读。前冢子头考古项目属于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重大项目工程的组成部分,遗址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包括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早中期、岳石文化、两周文化以至汉代的堆积,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形成了一座核心聚落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城址。

战国时期的TJ11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该台基大致呈圆形,面积达780平方米。因历代耕作取土,该台基顶部地面部分已被削去,从对残存的地下基址解剖情况来看,该台基筑造过程是先开挖1.5米以深的大型圆坑,坑底经过平整,填土取自外围黄色生土以及遗址外围壕沟中的黑色或青灰色淤土,以倾斜土层铺垫并压实或简单夯打的方式填平基坑。与台基大致同时期的灰坑、灰沟内,出土大量动物骨骼和制作精致的暗纹陶器等遗物;台基南侧约2米处,有一座一次性填埋7人的火坑,经鉴定为青壮年阶段的4男2女以及一位未成年入;台基西南侧一口水井的近底部坑土中,发现一件器形硕大的陶甗,复原后口径120、高90厘米。这些迹象表明,该台基应与祭祀等礼仪性活动有关。

与会专家对考古队的学术意识和问题意识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大家认为,该遗址虽然整体面积不大,发掘面积也比较有限,但两个季度的发掘已经揭示出该遗址年代跨度大,连续性强,遗迹遗物丰富,其在史前时期是一处较高等级的聚落,龙山时代进入繁荣期,其三重环壕的结构值得深入研究。进入夏商周时期,则逐渐演变为一处典型的基层聚落。两周时期少见居住遗存,反而以大型台基为主,可能具有“神圣空间”的属性。周代齐国采取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因而齐地保存有八主信仰等复杂多样的祭祀形式,祭祀对象也是复杂多样。前冢子头发现的周代台基遗存应该与这类祭祀遗存有关。专家们建议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搞清残存台基平面结构,以及与台基共存的其他遗存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人性骨进行年代测年,以明晰台基遗存的具体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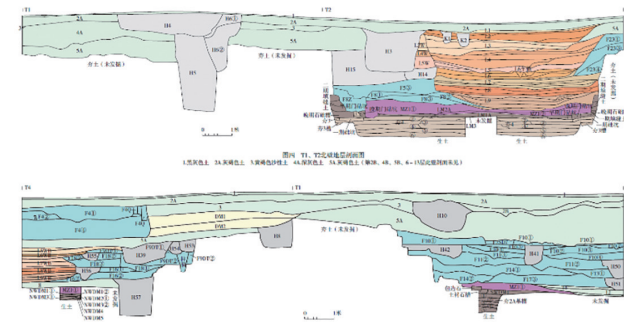
与会专家认为,该遗址面积不大,堆积不太深,但各时代遗址打破关系复杂,适宜开展长期的田野实践教学。目前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显示出其重要性,对于理解东夷华夏化的过程,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们建议将前冢子头遗址置于胶河流域乃至鲁东南地区区域系统调查中开展同步工作,明确遗址在区域社会网络中的性质和地位,进而使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解读与阐释更为深入;与海岱地区文明探源工程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推进海岱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研究;发挥山东大学学科优势,进一步推进地学考古、生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关注微地貌与古代人群活动的关系,同时要加强对文物保护力度,尽快提升遗址保护等级;积极转化利用考古成果,立足于高密考古实习基地,开展更多高质量公众考古活动,服务于周边群众,让文物活起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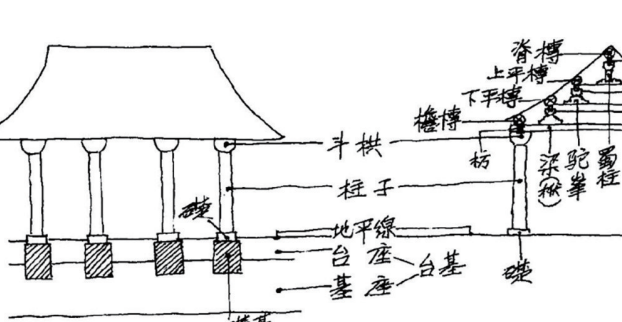
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发掘工作中解剖发掘的重要性

——以故宫考古工作为例

冀洛源



辽上京城南门遗址剖面图(来源:《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个体建筑台基和木架的组织结构与名称(来源:《中国古建筑考古》,宿白,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



2014年故宫东城墙基夯土基础解剖发掘(来源:《故宫东城墙基2014年考古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3期)

地上建筑的调查所发现。因此,借助解剖发掘,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工作能够积累大量填补文献记录空白,复原城址历代叠压关系,拟合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结构体系的重要实物史料。

对历史时期城址解剖发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源于几辈中国考古学者对城市考古,更是对中国考古学意义的深刻理解。正如朱岩石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交流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所讲:“地层解剖与遗迹关系确认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无论有多少合理的推测,实际上都不如有一张板上钉钉的剖面图拿出来有说服力。无论是我们对古代工艺、技术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对时代、早晚关系的回答,很多最终解决都是要落在对于地层学的回答上面……所以说科学地进行文化层、遗迹的解剖,就是我们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故宫是北京城内明清两代延续使用的宫城遗存,其位于元大都皇城、局部叠压元代的宫城遗址,其规模接近晚唐中原北方地区的州一级城市。因此,故宫的考古工作,属于中国城市考古的范畴。其首要目的,是重构紫禁城建筑的历史,其所需探寻的考古资料,可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早于元代的文化层;第二,元大都皇城、宫城建筑遗址;第三,明永乐创建紫禁城时期的建筑遗址;第四,明清两代相继改建的紫禁城建筑遗址及其与现存地上建筑的叠压关系。这些考古资料,几乎全部叠压在今天保存下来的故宫地面建筑之下。

故宫博物院对故宫现代地面以下地层的勘察工作,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除采用地质勘探和地球物理勘探手段外,还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借助建筑基槽、管线沟等进行局部勘察;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则借助局部补筑地基层进行零星勘察。据此,曾初步整理出全院夯土层厚度分布示意图,发表《故宫地基基础综合勘察》《故宫建筑基础的调查研究》等多篇勘察记录,为保护故宫地下遗迹与地上建筑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故宫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故宫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的正式考古发掘,使得此项工作有了重大突破。2014年,在故宫东城墙南段内侧进行发掘,揭露出明永乐时期城墙墙基、散水、沿墙排水沟等重要遗迹,并通过局部解剖,首次探明东城墙基以下明永乐时期夯土基础的层位、结构、厚度及其叠压的生土层情况。2015—2016年,在隆庆门西侧进行发掘,通过局部解剖,发现“层位关系清楚的清代排水沟和砖铺面、明后期砖铺面、明中后期门和墙基址、明早期礅墩基址、元代礅墩和夯土层基址等五组遗迹”。据此,我们初步掌握了明永乐时期紫禁城城墙、建筑以下夯土基础的实际情况,进而首次找到永乐夯土所叠压的元代宫城夯土基础的遗存,两者均用碎砖瓦与黄土交替夯筑,做法与《营造法式》壕寨制度“筑基”条的记录基本相符。此外,在慈宁花园东院遗址、长信门明代建筑遗址、东南角楼角台北侧遗址等地的发

掘,不仅通过解剖揭露出大量永乐夯土,还发现了其下叠压在生土层上的排木、地杵等结构,使我们对故宫内永乐夯土基础的认识得以深入。2014年至2015年,在南三所南部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出明、清两代建筑遗址。因其邻近今存的南三所清代建筑群,我们在发掘区内多点进行了局部解剖,依此厘清了今存南三所建筑围墙墙基、现代地面、明清建筑遗址、永乐夯土基础与生土层之间复杂且连续的叠压打破关系。

上述考古成果,有力促进了故宫博物院在考古遗址研究、保护与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随着更多同类发掘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分散发掘点上资料的积累,及以此对早期勘察成果的校验,将有助于我们对故宫内各类建筑遗址与地上建筑,建立分期与分区等方面的整体认识,构建元大都皇城、宫城与明、清北京宫城的考古资料框架。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研究提供难得的考古新资料,填补元、明、清三代古建筑研究在夯土基础资料方面的欠缺,更能成为北京城的城市规划与地质水文变迁等重大现实课题,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

在故宫考古工作中,也有因故无法进行解剖发掘的案例。2014年故宫南大库区域发现一处临近清代瓷窑的御窑瓷器残片埋藏坑。该坑开口自晚清层,由人工开挖,形制较为规整,其内出土数万件御窑瓷器残片,标本年代自明早期迄清末,埋藏年代临近宣统皇帝退位,出土标本对清代瓷窑沿革、明清陶瓷手工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埋藏坑及周边遗迹发掘清理完成后,受施工工程所限,未能对临近文化层进行扩方与解剖发掘,以致遗迹与周边零星所见早期夯土的平、剖面关系不清,未能形成如郑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一样完整的发掘资料,并且错过了探索南大库区域早期遗迹与文化层情况的良机。

在同类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中,以有限的发掘面积,通过发掘与解剖等方法,最大化地获取考古资料,以解决重要的学术与遗址保护问题,是考古工作者长期肩负的重任。同时,在墓葬、手工业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解剖发掘亦能增加考古资料的广度与深度。张忠培先生曾针对浙江龙泉窑窑洞窑遗址的发掘工作指出“进一步理清不同时期各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一些遗迹要做一定的解剖”。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解剖发掘对各类遗址的研究工作已具有日渐重要的学术意义;解剖发掘对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利用工作将会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正确认识解剖发掘在田野考古工作,特别是在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的重要性,并能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进行田野实践,已经成为对考古工作者的必然要求。期望故宫考古在此项工作中不断学习与探索的历程,能够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同仁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 | |
|---|---|
| <p>科技保护</p> <p>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p> <p>科学管理</p> <p>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p> <p>创新服务</p> <p>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p> | <p>遗址</p> <p>博物馆</p> <p>发掘现场</p> <p>档案馆</p> <p>图书馆</p> <p>旅游景区</p> |
|---|---|

联系人: 张磊 1357270596
 座机: 029-8834639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